



阅读真切鲜活的城市妈妈群像

近年来,关于“母职”的讨论和反思层出不穷。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、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今天,女性自身以及全社会对于母职的认知,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?为何中国的母亲们往往还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感到两难,苦恼于如何才能做一个平衡一切的好妈妈,或是在追求自我和成为一名以孩子为中心的“合格”母亲之间不断纠结?有关母职的讨论,大多关注家庭还是个体优先、孩子为中心还是女性自我追求为中心的女性两难境地,在私人空间里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法,从而忽略了社会的、时代的、外部的因素。

近日出版的《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》,是一本开拓性的本土母职访谈。作者泓舟与二十多位城市中的母亲促膝对话,记录了职场妈妈、单亲妈妈、全职妈妈、两代人共同育儿等不同育儿条件下的女性。泓舟曾是新华社记者,现在是一名专栏作者、媒体人,也是一位妈妈。泓舟带着母亲的直觉与关怀,记者的技巧,以及学者式的反思,结合自身的经验和对同时代妈妈们的细致观察,试图寻找解决女性如此疲惫与困扰的线索——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、职业生涯设计里和公共育儿制度里……



女性的每一次选择,都要经过看不见的复杂决策

今天的城市女性似乎已经拥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选项,掌握了更多的自由。一百年前,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,相夫教子依然是最主流也是最安全的选项。而如今,她们可以进入任何职业领域,成为任何人。在现代科技和科学育儿策略的帮助下,育儿的难度降低了,她们可以一边履行好母职,一边和男性一样在事业上大放异彩。妈妈们的生命宽度似乎被拓展了。主流文化积极地将每一位“适龄”女性推向母亲的角色,歌颂、赞美她们,社交媒体上充斥

着各种美丽的“超人妈妈”的形象。当妈妈的选择真的变得更轻松了吗?

在光鲜亮丽的辣妈们的另一个极端,更普遍可见的是焦虑的、愤怒的、迷茫的,甚至是陷入产后抑郁的妈妈,但她们的声音却往往被伴侣、家庭乃至社会忽视了。在《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》里,化名为“小熊”的年轻妈妈,是一名飞行员的妻子,生育前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但怀孕之后,由于双方父母都不能到夫妻所在的城市来帮忙带娃,考虑了所有选项之后,她无奈地说:“我没有第二个选择,只能做

全职妈妈”。她将高跟鞋和职业套装束之高阁,每天踩着平底鞋围绕着孩子奔忙。身份转变后的小熊默默在心底怀念着从前的那个自己,因为心理落差而郁郁成疾。

为什么今天的女性在看似可以选择的背后,会有如此多的左右为难和进退维谷?而几乎不会有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,会像母亲们一样陷入选择的两难?随着访谈和写作的深入,泓舟愈发感到,女性已经在职场、家庭、各种人际关系里,进行了太多的自我反思,做出了太多看不见的选择。男性从小被教育在广大

的世界里不断探索,勇往直前,他们的每一个人生决定,都指向更好的未来。很多现代女性从小也被鼓励像男性一样进取、竞争,但一旦进入婚姻、成为母亲,向前冲的姿态和速度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,人生事项的重要性都要重新排序。因此,她们每一次选择的背后往往要经过更为复杂的决策流程。书中的另一名女性,在选择生育后选择回归职场,但还是与原本齐头并进的丈夫拉开了很大差距。她感叹道:“为什么他还是他,我就不一样了?”婚育选择背后的暗涌,或许只有女性可以体察。

相关链接

“第二轮班”

上世纪80年代末,美国社会学家阿莉·拉塞尔·霍克希尔德在《职场妈妈不下班: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》一书中,提出了“第二轮班”概念——很多女性在每天8小时全职工作即“第一轮班”结束后,回到家里还得继续料理家务、照顾家人。霍克希尔德在访谈中敏锐地发现,很多女性白领都不得不疲于奔命两头兼顾。这一说法最初即来自一名受访女性,尽管她非常抗拒将家务劳动当作工作,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生活几乎就是不间断的劳作:“上班的时候,你在干活,当你回到家,还是干活。然后,你再回去上班,继续干活。”

为什么会出这种状况?答案也许令人惊讶——这正是女性解放所带来的。美国人的性别意识与社会文化变迁密切相关。“父亲”这个身份经历了三个阶段,每个阶段都回应着经济变迁:最初的农业时代,父亲作为“一家之主”,在家中承担教育和训练儿女的职责;19世纪初以后,随着经济活动和职业训练转向家庭之外的工作场所,父亲将养育儿女的责任更多留给妻子——在前两个阶段,父亲的形象通常都是疏离而严厉的;直到20世纪,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门,在学校、工厂和办公室建立起全新的自我认同,社会文化中才出现“慈父”的观念。霍克希尔德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如今,美国处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,但父亲身份还仍处于第二阶段。”据《现代快报》、新华社客户端

平衡是个伪概念:这不是平衡,这是取舍

能否平衡好工作和家庭,一度是衡量现代女性是否是位好妈妈的标准。在社会期待和自我要求的双重压力之下,许多女性不得不努力化身“六边形战士”,拼命扮演好家庭内外的每一个角色。在《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》中,泓舟自述:“多年前,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性朋友对我说,永远不要幻想平衡工作和家庭,那是不可能的。彼时,我还沉浸于初为人母的喜悦和兴奋中,尚存天真,认定自己可以安顿好生命中的每个角色,及其所赋予的多重责任。一年、

两年、三年……做妈妈的时间越长,我越发觉个人的空间在一点点被压缩。这不仅关乎时间管理的问题,还有心与力的两难。”而这也是她选择写作本书,为那些陷入平衡陷阱的母亲发声的动力。

作者泓舟的采访对象普遍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,且有能力、有资源为孩子提供优质的养育环境、教育条件和亲子陪伴。在成为母亲之前,她们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有着亮眼的表现;生育后,她们也都希望能保留职场人士和母亲的双重身份,从两

者的平衡中找到快乐以及令自己安心的成就感。然而,在书中我们看到,几乎没有一位母亲能够自如地同时驾驭好本职工作和母职工作。职场妈妈们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,以适应兼顾照料子女的需求,每天下班后回到家的育儿工作变成了美国社会学家阿莉·霍克希尔德所描述的“第二轮班”。两种身份的高压之下,她们感到自己“既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妈妈,又是一个糟糕的员工”。

时间花在哪里,成效就在哪里。所有人的时间都是公平而

有限的,投入到家庭中,就不得不牺牲用于提升自我和职场拼搏的那一部分。时间困境并不是母亲才会面临的问题,现代社会的男性同样被上班、加班、应酬占据了大部分的精力,大大挤压了在家庭内部的投入——这其中既有个人主动的选择,也有工作环境竞争激烈的无奈。然而与男性相比,女性在种种取舍之间,往往更多倾向于和家庭产生深度连接,从而放弃了向外部的世界的探索。“舍”掉了一部分自我的她们,真的能得到应得的回报吗?

已经知道了母职困境,该为她们做些什么?

作为女性,也是一名母亲,泓舟没有止步于为母亲们发声。在《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》写作中分享这些平凡而驳杂的女性个体经验的同时,作者也尝试探索可实践的、“接地气”的母职松绑策略。

“清醒”是书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,泓舟认为,女性首先要从工作一育儿难以平衡的困扰中清醒过来,认知到自己的局限,积极调动外部力量。她把女性清醒的瞬间描述为“一块难以化开的薄荷夹心硬糖,顽固地待在嘴里,直到包裹在外的甜味一层层融化,一股透彻的清凉直冲鼻腔”。

泓舟敏锐地察觉到,今天城市女性对职业、婚姻、育儿等的

认知已经发生了变革。在母亲这一角色之外,她们渴望真正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,不再甘愿成为小家庭里一味牺牲和奉献的“xx妈妈”。以离婚为例,传统家庭中,选择离婚的母亲往往被认为对子女不够负责,“为了孩子忍一忍”是许多婚姻尚能延续的重要原因。而泓舟书中一名女性在选择离婚后,履行好母职的同时也没有坠入“内疚式育儿”的陷阱。她清醒地表示,自己“对一定要有很完美的家庭,没有特别的执念”。

泓舟也提醒我们,女性自身清醒之外,更为重要的是,他人和社会如何为妈妈们提供更全面的母职支持,共同创造更友好的育儿环境。家庭内部来说,泓

舟认为,男性并非天生就不擅长带娃,他们在育儿中应当扮演和妈妈同样重要的角色。她给受访的爸爸们进行了分类:妈妈带娃,爸爸旁观的“家具爸爸”;两地分居,周末团聚的“周末爸爸”;互为彼此帮手的“救火队员爸爸”;积极承担责任的“帝企鹅爸爸”……或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,或面临着“时间贫穷”的问题,爸爸们的育儿投入明显少于妈妈们。然而随着公众对家庭劳动性别分工的讨论越来越多,很多男性的观念和选择也在悄悄发生转变。他们开始看见和重视妻子的需求,并学习和思考该如何进行有效的支持。

泓舟温柔地向那些自责的、焦虑的“不完美母亲”揭示:母职

的履行,与社会的发展、生育政策的支持等等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。换言之,如果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,单靠女性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,而且会困难重重,并且容易陷入自我能力不足的怀疑之中。因此,仅仅要求女性自己做出人生选择并为之负责是不对的,平衡也不是要求女性付出更多的借口。所有人应当看见母亲的困境,并协力创造一个更良好、更适宜育儿的公共环境。也因此,母职相关的作品不应当只由女性作者写就,也不应当只有身为母亲读者关心。期待在本书的启发下,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更多不同视角的本土母职书写,听见更丰富的声音。